

日本民俗学译丛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 理论与方法

王晓葵 何彬 编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果



學苑出版社

日本民俗学译丛之三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 理论与方法

王晓葵 何 彬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 / 王晓葵, 何彬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77 - 3646 - 5

I. ①现… II. ①王… ②何… III. ①民俗学 - 日本 -
文集 IV. ①K893.1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8535 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方晓喆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刷厂: 河北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7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日本民俗学译丛》编委会

顾问 [日] 福田亚细男 刘魁立

名誉主编 康保成

主 编 王晓葵 何 彬

《日本民俗学译丛》序 一

本丛书共三卷，精选了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有重要意义的文献，译成中文出版。希望能够成为关心日本民俗学的中国朋友，以及在中国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及学生们的他山之石。

日本的民俗学大约形成于百年之前。在 18 世纪，探究日本特有之文化的“国学”，以及 19 世纪后半由欧洲引进的人类学的“土俗研究”，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的两大源头。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却始自柳田国男 1908 年夏对九州地区山间村落的刀耕火种及原始狩猎方法进行的调查，以及同年秋他从出生于东北的一个青年那里收集流传于当地的种种奇闻逸话。后来，柳田与聚集于其门下的青年才俊们一起建立了民俗学研究组织，开展了研究活动。日本民俗学就这样作为“在野之学”发展起来。民俗学进入大学殿堂，是 1958 年以后的事。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民俗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学问”。民俗学教育和研究基本上在大学中展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学习民俗学，要理解民俗学的体系，只要去阅读柳田国男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或《民间传承论》便可；而要研究具体问题，则去研习柳田国男论及这些问题的著作。可以说，民俗学的方法论凝缩于这两部著作之中。1934 年出版的《民间传承论》，其基础是前一年的 9 月起柳田每周在自己家中以其嫡系弟子为对象，做了前后三个月的专题讲座。因此，其内容民俗学研究的专门性较强。与此相对，1935 年出版的《乡土生活研究法》，同样以方法论为主要内容，但面向一般读者的概论性性质更为突出，对“救世助人”这一民俗学的社会使命

的强调也更为明确。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读了这两本书，便能够理解民俗学。即使在现在，这两本书也是了解柳田国男的学术理论，同时也是理解民俗学主要内容的基础文献。因此，本丛书将这两册书作为第一卷的内容。

第二卷是福田亚细男的《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该书出版于1984年，那时民俗学教育及研究已经基本在大学进行。这部著作是民俗学逐步脱离柳田国男的影响，开始独立发展的时期的成果。该书旨在通过对柳田国男民俗学理论的扬弃，探讨民俗学成为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的独立科学的可能性。因而一反之前学界对柳田单方面肯定的潮流，指出柳田的思想之中存在的问题和弱点，希望民俗学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和弱点而走向成熟。书中有不少不足之处，但无疑显示出了柳田以后的民俗学的风貌。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民俗学也在种种努力之下，向着新的阶段迈进。年青一代的民俗学家们关心的课题更加广泛，诸如城市化、人口的不均衡、环境污染、社会歧视、贫困、民族纷争等问题都开始成为研究对象。课题、方法的多样性使得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呈现出略显混沌的景观，但混沌之中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第三卷则选取了这个时期论文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分。

百年以来，日本民俗学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读者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日本民俗学与中国民俗学略有不同。19世纪中叶诞生于欧洲的民俗学，基本上是以故事、传说、民谣、世相传言等口头传承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初，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因这一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口头的民俗学”。不仅欧洲如此，美国也是一样，中国民俗学中的这一倾向也很强。而日本民俗学的研究，以生产活动、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年节、信仰等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可以称之为“行为的民俗学”。虽然也记录口头的传承，但视其为把握行为的手段，主要目的在于解明行为的历史性发展和变迁。日本民俗学对田野调查十分重视。相信日本民俗学的这一特色，对中国民俗学也有

借鉴作用。

我期待着中日两国的民俗学学者，能够相互借鉴，相互刺激，并将研究视野拓宽到整个东亚，同心协力，将民俗学建设成为顺应 21 世纪时代潮流的学问。本丛书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我衷心期待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们能够从本丛书有所获益。

福田亚细男

王 京（译）

2009 年 10 月

《日本民俗学译丛》序 二

今天，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来说，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胜利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四级名录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顺利进行。以这些活动为标志，我们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资料搜集工作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整个学界正在为今后民俗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努力。

经过多年奋斗，全国各地高校开办了民俗学课程，有了相关专业，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形成了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一支不小的队伍，这为今后的民俗学学术发展做了人才的储备。

要前进就要回头审视走过的道路，包括向国际学界借鉴的历程。这不单是为了总结过去，更多是为了开拓未来。

回顾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不能不看到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曾经受到外国民俗学的很大影响。单从借鉴的角度看，在发轫阶段，英国人类学派的潮流，曾为一些学界前辈所倚重。随后，日本学术著作的介绍，也对我国的民俗学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中叶有不短的一段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俗学界效法苏联，在民间文学或称人民口头创作的研究方面有了某些推进。改革开放以后，美、日、俄、德等国民俗学的学术思想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推介。

当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历程中，几代前辈学人也有自己可以称道的学术发现和理论贡献。

现在，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更全面了，我们的方法也更多样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新人、新作、新见解、新

成就日益增盛，人心思发展，大家正呼唤着中国民俗学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版《日本民俗学译丛》，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借鉴国外学术成就时，往往是通过一些不见经传的学者的著作。这些二三流的著作首先被翻译成中文，大家便当做经典加以引用和借鉴，有时甚至仅仅靠介绍和转述来了解顶尖学者的经典著作。对此我常常发出感慨。于此，我想到一则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据《五灯会元》第四卷载，唐代高僧赵州禅师问新来的僧人：“曾到此间么？”僧人回答：“曾到。”禅师说：“吃茶去！”又问另一僧人，僧人回答说：“不曾到。”禅师也说：“吃茶去！”后来院主问：“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禅师召唤院主，院主应诺，禅师仍说：“吃茶去。”

欲借他山之石以攻我邦之错，或许可以翻用“吃茶去”的公案说：“读原著去！”而且要读经典原著。

现在出版的这套《日本民俗学译丛》，收录了日本民俗学各个时期的部分重要著作，约略而精要地勾勒出日本民俗学发展的历史。

柳田国男作为日本民俗学的拓荒者，开创了日本这一学术领域的先河。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著作被相当一部分追随者俨然看作是这一领域的圭臬之作和“不二法门”。

福田亚细男教授的《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作为日本民俗学发展新时代标志的代表性著作，对既往的研究历程作了反思，同时开启了日本民俗学继续发展的新路。

《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第三卷《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精选了二十几位学界精英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论文是对日本数十年来民俗学学思和新见的一种十分精准、宏阔而概要的反映，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锦心绣口，但在各自时代都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能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觉得应该把《日本民俗学译丛》的三部书连贯在一起，认真研究、细细品味，会意文心当史读，定会有令人欣喜的收获。

中日两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交流、彼此借鉴，一定会为推进亚洲和世界的民俗学发展作出可贵的贡献。

最后，要感谢本书编者王晓葵、何彬两位教授，他们多年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对日本民俗学的发展有深入的了解，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为这套书的筹划、编纂、翻译、审校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最可贵的是他们编纂此书的创意，他们通过这套文集，将带领我们完成对日本民俗学发展历程的一次极为有益的巡礼。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福田教授，他不仅在本书选目方面做了精心的指导，还多次组织编者在周末或假日集中到神奈川大学，解答日本民俗的相关问题和翻译中的疑难。他和编者们一起伏案作业，翻阅和查找资料，探讨和解析生僻的方言词汇。福田教授是中国民俗学会的老朋友，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和两国学界的交流多有贡献。这套译丛再次见证了他对中国民俗学界的深厚情谊。本丛书论著的各位作者，包括柳田先生的后代家人，都欣然同意无偿转让著作权。我们对所有作者以及日本弘文堂出版社表示敬意和谢意。参与翻译的年轻朋友，有的是中国留日的博士生，有的是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年轻学者。他们虽然都从事民俗学研究，但都有繁忙的工作或学习任务，有他们的辛苦才换来我们阅读的愉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对文集的出版给予资助，位于京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还把本丛书的第一卷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列入“日文研翻译出版资助项目”给与翻译费用的支持。功德无量，令人钦敬。

谨为序。

刘魁立

2010年2月26日

编者的话

这套《日本民俗学译丛》终于面世了。在从企画、选稿、翻译到最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出版计划甚至曾经面临夭折的危险。幸而得到了多方面众多人士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才度过了各种难关。对此，我们很感激也很欣慰。可以说，它是中日两国民俗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晶。

首先，我们要感谢原著的作者和版权所有者。他们包括：柳田国男著作的版权人柳田富美子女士，《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的作者福田亚细男先生和出版社弘文堂，还有论文集《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所有作者。他们都慨然允诺我们无偿翻译出版他们的著作。柳田富美子女士还帮助我们和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向我们无偿提供了柳田国男先生珍贵的照片。

我们还要感谢所有的翻译者，他们在几乎没有报酬的条件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日方顾问、日本民俗学会原代表理事福田亚细男先生从企画阶段开始就事必躬亲，过问每一个细节。除了帮助联系版权事宜、推荐文稿，还专门抽出时间解答我们翻译中的问题。中方顾问、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一直关心本丛书的出版，在百忙中为本丛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在这里，我们向这两位民俗学界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教授主持将丛书纳入该中心的出版资助项目，为丛书的出版解决了部分资金的问题。本套丛书的第一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还获得了位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翻译出版项目

的资助。长期持续不懈地对民俗学支持的学苑出版社，鉴于丛书的学术价值，在资助有限的情况下，将其列入出版计划。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过《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编辑和参与具体的翻译作业，我们从中学习到许多。也希望这套中文版《日本民俗学译丛》，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解日本民俗文化、了解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原著依据。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丛书的出版比原计划推迟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责任编辑刘丰、方晓喆用他们的宽容和耐心，鼓励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编 者

2010年3月

目 录

日本民俗学的现状与课题

日本民俗学的现状与课题	铃木正崇 (1)
民俗学与近代	岩田重则 (21)
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	
——为何民俗学疏离了“近代”	岩本通弥 (30)
柳田国男的“世界民俗学”再考	
——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视角	桑山敬己 (48)
都市中的传承与调查	仓石忠彦 (78)
“乡土”的民俗研究	千叶德尔 (91)

民俗学的方法与视角

“历史民俗学”札记	宫田登 (113)
比较研究	
——从乡土研究到日本文化论	佐野贤治 (129)
地域研究的方法	福泽昭司 (147)
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	饭岛吉晴 (159)
民俗学与地理学	八木康幸 (175)
民俗调查	
——再论传承人与传承母体	古家信平 (192)
民俗调查的两种类型	小松和彦 (202)
“乡土”与民俗学	真野俊和 (214)

记忆与祖先观念	矢野敬一 (239)
关于自然之民俗研究的三大潮流	菅 丰 (268)
提倡生态民俗学	野本宽一 (287)
试论环境民俗学	鸟越皓之 (294)

民俗学与现代社会

世界遗产“白川乡”的“记忆”	才津祐美子 (299)
论地方博物馆存在的问题	武士田忠 (326)
博物馆展示的理念与评价的方法	大冢和义 (340)
在保护与观光的夹缝中	
——民俗艺能的现状	桥本裕之 (348)
民俗学研究中个人生活史的课题和意义	
——从祭礼研究的角度论起	中野纪和 (358)
论灾害民俗学	櫻井龙彦 (385)
民俗学视野中的“消费”	阿南透 (405)
日本民俗学史简表	(422)
编者后记	(428)
作者、译者简介	(429)

日本民俗学的现状与课题

日本民俗学的现状与课题

铃木正崇 著

赵 晖 译

引 言

现今有不少人在议论“黄昏的民俗学”、“落日之中的民俗学”等。诚然，民俗学确实存在衰退的兆头，其原因包括：作为传承母体的村落社会的瓦解、依存于柳田国男个性的学问性质、模糊概念的运用与方法论的脆弱性、对历史推测和重构的执著等。另外，始自20世纪60年代的高度经济增长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当我们重构民俗学时，有必要在把握历史状况的基础上，谦虚谨慎地适应现状。

日本民俗学经过大正3年（1913）《乡土研究》创刊前后的草创时期，到1930年确定方法论并转入了其确立时期。1935年全国性的组织“民间传承会”得以创立，到“二战”后的昭和24年（1949）改称为日本民俗学会。在接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民俗学大系》（平凡社）与《定本柳田国男集》（筑摩书房）出版，此时可谓是民俗学的发展时期。柳田国男于1962年去世后，日本经济进入高度增长期，日本社会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全面继承柳田国男学术思想的民俗学，仍把传承的基本单位设定为村落，未能及时地适应这种变化。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展开了都市民俗研究，却缺乏应有的独特性。只不过是反复掀起的“柳田热”隐蔽了民俗学正趋衰退的事实，似乎使之有了自信。其实，后来日本在生活、流通、经济领域发生了急速变

化，20 世纪 70 年代的农村开发与人口过疏化、20 世纪 80 年代的泡沫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的高度信息化等，都加快了其衰退的速度。1999 年，日本民俗学会创立 50 周年。此时，它身处政治及经济的大变革之中，不得不经受人们对其根本的是非曲直而提出来的各种质疑。在此情况下，讨论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是极其困难的。笔者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部分内容做一些展望。

一、重构的趋向

近年来，重构民俗学的气势逐渐得到提高。来自内部的动向包括：作为“民间学”或“在野之学”的自我意识、对感性或心性的重视（知觉、感情、价值的内在化）、环境民俗学的提倡、柳田国男全集出版后的文本批评等。此外，有些人还从“回归性”（自反作用，reflectivity）的角度，对民俗、传承、常民等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再探讨。这同时也是对民俗的叙述方式重新给予关注、并对束缚其学科属性的时代或政治进行了反省。民俗历来被视为民间传承，或者不断重复的生活与思考样式。有人认为：“传承”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是蕴涵传播与继承功能在内的分析概念。既然如此，这种观点就无法否定民俗的变异，并坦然接受新民俗的生成与下一代的继承。柳田国男也对稳固性与易变性（习俗与风俗）产生了极大兴趣。^①然而，民俗学向来把充满乡愁的“传统”投射到民俗之上，对此赋予了古风、固有、基层、不变、持续、善等各种价值。与之相对，作为参照对象的“近代”则被赋予了变异、丧失、破坏、恶等负面价值。民俗学善于判定价值，它的言论与日本是什么、日本人的自我意识是什么等问题相呼应，强化了近代国家并生成了作为“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②的日本。这种趋向与“二

① 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定本柳田国男集》24，筑摩书房，1970（1931）。

② アンダーソン《想像の共同体——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白石隆、白石さや訳，リプロポート，1987。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Editions, 1983。

战”前的殖民地主义不无关系。由此，原本多样化的日本，经过整顿与融合，收敛为一个日本，进而构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神话”^①的基础。“民俗”被知识分子发现，这是与“近代”构成正反两面的政治性言论，未必与民间传承相吻合。直到近代，“民俗”与“传统”在消灭和生成同时发生的间隙中得以发现。

我们有必要明确一点，所谓“传统”是把过去联结于现在的媒介性表述，是与近代形成对立的关系概念，其本质包括不易变异的侧面和被改造的侧面。“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视角，便是不可缺少的基础。^②在现代，应该摒弃“前近代的民俗社会”这种叙述方式，而有必要关注前近代、近代、后近代复杂交错的当下变化，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民俗文化论。历史的观点仍是必要的，数量庞大的地方志或《旅行与传说》、《民间传承》等，都可以作为“史料”而利用。在调查中，不但需要与当地人的密切合作以追求民俗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还需要对脱离民俗固有的语境而启动的民俗学主义（*folklorism*）保持敏感，^③从村落或地域共同体之外发现民俗的传承母体，去考察亚文化的形成母体。

二、田野作业

过去，民俗学者把对象限定为明治、大正时期的出生者，寻找那些通过体验而能叙述所谓传统民俗的人们，这种时代早已过去。以访谈来确定地域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并用史料来推定民俗

① 小熊英二《单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

② ホブズボウム、レンジャー編《創られた传统》，前川啓司、梶原景照等訳，纪伊国屋书店，1992（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83）。

③ モーザー《民俗学の研究课题としてのフォークロリスムス》（上、下），河野真訳，《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紀要》90、91号，1989、1990年，第63—95、第1—38页。